

陆氏家学与渭南文章

张兴武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陆游文章雍雅典则,其风度气韵首先得益于家学熏陶。放翁自幼深受祖、父精神教诲,耳提面命之间渐告淹博。他没有学术专著,却能将考订典章名物、深究字词训释、辨析学术得失的家学功夫,自觉运用于散文、笔记的创作之中;其游记之作亦能征用金石资料,引据诗文作品,与相关地理相参证。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陆氏家学的固有内涵,更拓展了诗文解读与批评的新途径。另一方面,陆游的杂著著作和史论文章,也能充分继承其祖、父治《春秋》的理念与方法,将借古鉴今的“微言大义”贯穿于历史叙事之中,援据精详,简实严谨。陆游始终保持着经史研究的思维逻辑和习惯,其不少散文形同札记,或拾遗补缺,或改错纠谬,体现了学以致用追求与特点。学术研究与文章写作的关联互动,终使陆游散文创作“卓然自为一家”。从这个角度看,其典型示范价值毋庸置疑。

关键词:陆游;家学;文章;关联互动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3-0085-17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3.012

陆游不仅以敷腴俊逸的诗作垂名后世,其经史之学与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也深受瞩目。或谓其“学问该贯,文辞超迈,酷喜为诗;其他志铭记叙之文皆深造三昧;尤熟识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以故声名振耀当世”,[1](第165册,P.854上)实为的论。不过,放翁在学术及文章两方面的非凡业绩向来为诗名所掩,悉心观照者既少,研究遂不够深入全面。窃以为欲深知放翁之诗,则先须通晓放翁之学,而“山阴陆氏”自陆佃以来传承不衰的丰厚家学,不仅成就了《渭南文集》《入蜀记》等精美文章,更使陆游对“诗家三昧”有了不同寻常的感悟和理解。虽说前代学者对“山阴陆氏”家学制约《渭南》文章的诸多因素颇有争议,但两者之间表里相济的内在逻辑毕竟不可否认。

精心研读先秦儒学典籍,推见王道治乱之本,探究“礼家、名数之说”,[2](卷343,P.10920)潜心“名物训诂之学”,[3](卷15《毛诗名物解》提要,P.122上)这既是陆氏家学的固有之义,更是放翁“以文名当时,其言雍雅典则,足为学者资益”[4](吴宽《新刊渭南集序》,P.1)的渊源所在。元人杨载《诗法家数》尝曰:“凡作诗,气象欲其浑厚,体面欲其宏阔,血脉欲其贯串,风度欲其飘逸,气韵欲其铿锵,若雕刻伤气,敷衍露骨,此涵养之未至也,当益以学。”[5](下册,P.1736)其实,非独诗,文章亦然;《渭南》文章得益于陆氏家学的风度气韵正可作如是观。

赵宋有国以后,“山阴陆氏”才俊辈出,衣冠

收稿日期:2015-03-28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宋代士人的家学、婚姻与诗文创作研究”(14BZW059)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兴武(1962-),男,甘肃会宁人,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

张兴武:陆氏家学与渭南文章
ZHANG Xing-wu: On Lu You's Family Learning and Weinan Essays

85

之盛寔复如晋、唐时。大中祥符中陆轸以进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馆。轸子珪,官至国子博士。珪子佃,累官至尚书左丞。佃生宰,官至中散大夫。宰四子,皆以文学政事自奋,放翁其一也。[6](P.5)就陆氏家学的兴盛发展而言,陆佃的功绩最为显著。他著《二典义》《礼象》及《春秋后传》等以发明礼家名数,复撰《尔雅新义》《埤雅》与《鹖冠子》以传名物训诂之学,诗文创作则有《陶山集》传世。陆宰承其父学,亦撰有《春秋后传补遗》。[4](卷202《艺文志》,P.5065)陆游自幼深受祖、父精神熏陶与教诲,耳提面命之间渐至淹博,而其潜心为学的恒心更是至老不衰。开禧元年(1205)四月,放翁撰《东篱记》,称其告归之后“考《本草》以见其性质,探《离骚》以得其族类,本之《诗》《尔雅》及毛氏、郭氏之传,以观其比兴,穷其训诂。又下而博取汉、魏、晋、唐以来,一篇一咏无遗者,反复研究古今体制之变革,间亦吟讽为长谣短章,楚调唐律,酬答风月烟雨之态度。盖非独娱身目、遣暇日而已”。[7](第222册,P.129)由此可知,放翁一生都在克己自奋,自觉传承佃、宰之学。

陆氏家学的核心要义与王安石“新学”的关系极为密切。陆佃早年“蹉履从师,不远千里,过金陵,受经于王安石”,熙宁三年(1070)举进士甲科。后为郢州教授,召补国子监直讲。“安石以佃不附己,专付之经术,不复咨以政。”及安石辞世时,“佃率诸生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2](第31册,PP.10917-10918)徽宗即位以后,他官至吏部尚书,拜尚书右丞,迁尚书左丞,遂执政;后以名列“元祐党籍”,出知亳州而卒。陆佃颇尊王氏“新学”,如所撰《礼象》一书意在修订聂崇义《三礼图》之不足,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器,与聂《图》大异”,[8](卷2,P.50)可知其治学方法与泥古尊圣者判然有别。佃所著《尔雅新义》颇多创新,《序》称:“旧说此书始于周公以教成王,子夏因而广之。虽不可考,然非若周公、子夏不能为也,故予每尽心焉。虽其微言奥旨有不能尽,不得谓不知者也。岂天之将兴是书,以予赞其始。譬如绘画,我为发其精神。后之涉此者致曲焉,虽使仆拥篲清道,跂望尘躅可也。”[7](第101册,P.208)和《尔雅新义》同时面世的还有《埤雅》,该书有《释鱼》《释兽》《释鸟》《释虫》《释马》《释木》《释草》及《释天》等八大门类,陈振孙谓其“本号《物性门类》,其初尝以《释鱼》《释木》

二篇上之朝,编纂将就,而永裕上宾,不及再上,既注《尔雅》,遂成此书。其于物性精详,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说》”。[8](卷3,P.88)所谓“援引甚博”而“多用《字说》”,正是陆氏家学的特点所在;其如四库馆臣云:“其说诸物大抵略于形状而详于名义,寻究偏旁,比附形声,务求其得名之所以然。又推而通贯诸经,曲证旁稽,假物理以明其义。中多引王安石《字说》。”[3](卷40《埤雅》提要,P.342)陆佃虽以不附安石新法而名入党籍,然其学问渊源实有所出。若能撇开宗派之争,单就学术本身来看,其“曲证旁稽”以发明《尔雅》“微言奥旨”的学术探索,仍然值得尊重。

陆游传承家学,在名物训释、典章考绎等方面多有建树。尤其是自淳熙末年(1189)退归山阴镜湖以后,他取法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9](中册《老学庵诗注》,P.519)的精神,筑庵湖边,搜集整理各种名物典章及逸闻趣事,撰成《老学庵笔记》十卷。陈氏称陆游“生识前辈,年登耄期,所记见闻,殊可观也”;[8](卷11,P.336)四库馆臣则谓该书所载“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3](卷121《老学庵笔记》提要,P.1046)所有这些评价均不失客观公允。放翁传承陆佃学术,对王氏“新学”深怀敬意。如《老学庵笔记》卷九载:“王荆公熙宁初召还翰苑。初侍经筵之日,讲《礼记》‘曾参易簣’一节,曰:‘圣人以义制礼,其详见于床第之间。君子以仁行礼,其勤至于垂死之际。姑息者,且止之辞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于且止者也。’此说不见于文字,予得之于从伯父彦远。”假如不是倾心向往,要完整重复这种“不见于文字”的《礼记》讲解恐非易事。当然,在王氏“新学”著作中,《字说》一书最受陆氏子孙推重,《老学庵笔记》云:

《字说》盛行时,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皆作《字说解》数十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十卷,又有刘全美者,作《字说偏旁音释》一卷、《字说备检》一卷,又以类相从为《字会》二十卷。故相吴元中试辟雍程文,尽用《字说》,特免省。门下侍郎薛肇明作诗奏御,亦用《字说》中语。予少时见族伯父彦远《和霄字韵诗》云:“虽贫未肯气如霄。”人莫能晓。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说》霄字,云:‘凡气升此而消焉。’”其奥如此。乡中前辈胡浚明尤酷好《字说》,尝因浴

出,大喜曰:“吾适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说》直字云:在隐可使十目视者直。吾力学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时此学既废,予平生惟见王瞻叔参政笃好不衰。每相见,必谈《字说》,至暮不杂他语;虽病,亦拥被指画诵说,不少辍。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10](P.25)

按:王之望字瞻叔,晁公武字子止。其实,从传家学的角度看,陆游对“新学”的尊崇极为自然。虽然没有《埤雅》那样的解字之书,但他撇开汉唐学者的固有成说,对字音字义别作新解的做法,与王氏《字说》一脉相承。如曰:“世多言白乐天用‘相’字,多从俗语作思必切,如‘为问长安月,如何不相离’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声,至今犹然,不独乐天。老杜云:‘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亦从入声读,乃不失律。俗谓南人入京师,效北语,过相蓝,辄读其榜曰‘大厮国寺’,传以为笑。”[10](P.124)另如:“梅宛陵诗好用‘案酒’,俗言‘下酒’也,出陆玕《草木疏》:‘荇,授余也。白荇,叶紫赤色,正圆,茎寸余,浮水上,根在水底,与水深浅。茎大如钗股,上青下白,煮其白茎,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今北方多言案酒。”[10](P.138)凡此种种,既在王氏《字说》中司空见惯,更成为陆氏家学的当行做法。

严格说来,陆游的名物训释绝非单纯和自成体系的语言学研究,其征引考订的语词对象,往往出自一些名流大家的诗文作品,而考订过程又关涉到对这些作品的正确理解。有些考订不仅能拓展读者的视野,还能有效提升审美想象的有效空间。因此,其研究本身,既是对“陆氏”家学的传承与变革,更具有丰富文学批评方法、拓展诗文解读途径的特殊价值。如曰:

韩退之诗云:“夕贬潮阳路八千。”欧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谓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为歇后,非也。《书》:“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论语》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10](P.31)

东坡诗云:“大弨一弛何缘彀,已觉翻翻不受檠。”《考工记》:“弓人寒莫体。”注曰:“莫,读为定。至冬胶坚,内之檠中,定往来体。”《释文》:“檠,音景。”《前汉苏武传》:“武能网纺缴,檠弓

弩。”颜师古曰:“檠,谓辅正弓弩,音警;又巨京反。”东坡作平声叶,盖用《汉书》注也。[10](P.90)

如此解释,对正确理解韩愈、苏轼等人的相关诗句,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虽说放翁在字词训释方面很难超越乃祖乃翁,但他能触类旁通,将严谨求实的治学理念与方法转移运用到地志考述方面,功绩颇为卓著。放翁尝自述曰:“余少读地志,至蜀汉巴夔,辄怅然有游历山川、揽观风俗之志。”[7](第222册,《东楼集序》,P.334)也许正是这种自幼养成的好奇心,最终促成了他乾道六年(1170)的入蜀之旅。此行历时近半年,陆游于旅途中按日作记,撰成《入蜀记》六卷。四库馆臣尝列举十六例,以明其史地考述之精确严谨,曰:“游本工文,故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非他家行记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比也。”[3](卷58《入蜀记》提要,P.530上)对于45岁的陆游来说,将亲身游历与史地考察结合起来,发挥家学优势,形诸文字,这是一种必然选择。他旋游旋记,仿佛是通过借景转换、次第展开一幅幅震撼人心的历史画卷。如:

(七月)七日,早游天庆观。在治城山之麓,地理家以为此山脉络自蒋山来,不可知也。吴、晋间,城垒大抵多因山为之。观西有忠烈庙,卞壺庙也。以嵇绍及壺二子珍、盱配食。绍死于惠帝时,在壺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壺,非也。庙后丛木甚茂,传以为壺墓。墓东北又有亭,颇疏豁,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贞亭,后避讳改焉。忠贞壺谥今日忠孝,则并以其二子死父难也。云堂道士陈德新字可久,姑苏人,颇开敏,相从登览。久之,遂出西门,游清凉广慧寺。寺距城里余,据石头城下,临大江南,直牛头山,气象甚雄。然坏于兵火。旧有德庆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后主撮襟书,石刻尚存,而堂徙于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禅师文》曰:“保大九年,岁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药之奠,致祭于右街清凉寺悟空禅师。”按南唐元宗以癸卯岁嗣位,改元保大,当晋出帝之天福八年,至辛亥,实保大九年,当周太祖之广顺元年。则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为后主,非是。长老宝余,

楚州人,留食,赠德庆堂榜墨本。食已,同登石头,西望宣化渡及历阳诸山,真形胜之地。若异时定都建康,则石当头仍为关要。或以为今都城徙而南,石头虽守无益,盖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横贯城中,六朝立栅断航之类,缓急不可复施。然大江天险,都城临之,金汤之势,比六朝为胜,岂必依淮为固耶? [11] (P.13)

这段文字,不仅全面描述了石头城的地理形胜和战略地位,且历考有关忠烈庙和清凉广慧寺的传说记载,辨正旧说,揭示其实。作者详于史实,考述过程严谨平实,其博学雅逸的人格魅力由此得到充分展示。

需要强调的是,和名物训释一样,陆游的史地考察时常和具体作家、作品联系在一起。作者多以睹物思人的特殊方式追忆前贤,寄托幽思,文笔所及往往出人意表。如《东屯高斋记》曰:“少陵先生晚游夔州,爱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斋。质于其诗,曰次水门者,白帝城之高斋也;曰依药饵者,瀼西之高斋也;曰见一川者,东屯之高斋也。故其诗又曰‘高斋非一处’。予至夔数月,吊先生之遗迹,则白帝城已废为丘墟百有余年,自城郭府寺,父老无知其处者,况所谓高斋乎!瀼西,盖今夔府治所,画为阡陌,裂为坊市,高斋尤不可识。独东屯有李氏者,居已数世,上距少陵,财三易主,大历中故券犹在,而高斋负山带溪,气象良是。李氏业进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属予记之。” [7] (第223册, P.90) 假使没有陆游的考察与解释,杜诗所谓“高斋非一处,秀气豁烦襟”究指何种情境,恐怕人们很难确解。另如《入蜀记》卷四载: (八月) “十九日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堂中有苏公像,乌帽紫裘,横按筇杖,是为雪堂。堂东大柳,传以为公手植。正南有桥,榜曰‘小桥’,以‘莫忘小桥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无渠涧,遇雨则有涓流耳。旧止片石布其上,近辄增广为木桥,覆以一屋,颇败人意。东一井曰‘暗井’,取苏公诗中‘走报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齿,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亭名见苏公及张文潜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号南坡,今已残伐无几,地亦

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国寺,亦苏公所尝寓。兵火之余,无复遗迹。惟绕寺茂林啼鸟,似犹有当时气象也。” [11] (P.36) 苏轼被贬黄州,诗文创作大放异彩。州有胜境曰“东坡”,公以之自号。陆游亲临其地,拜谒“东坡”、“雪堂”,流连“小桥”、“暗井”,每到一处,即以所记苏轼名句与眼前景象对照比勘,感慨之余,更对这位“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的“忠臣烈士”满怀景仰。 [7] (第223册《跋东坡帖》, P.23) 要之,无论杜甫三迁“高斋”的豁达胸怀,还是苏轼被贬黄州时的闲雅情致,经过陆游的考察和比勘,都生动呈现于读者面前;原本冰冷的地名,终被赋予了文学审美的全新内涵。

此外,陆游严谨翔实的地志考察,还能为读者提供诗文欣赏的新视角;以纠正字词解释为表象的考订分析,更能让人在悉心品读之中别有所获,会心一笑。如《老学庵笔记》云:“欧阳公谪夷陵时,诗云:‘江上孤峰蔽绿萝,县楼终日对嵯峨。’盖夷陵县治下临峡,江名‘绿萝溪’。自此上溯,即上牢关,皆山水清绝处。孤峰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万竹间,亦幽邃可喜,峡人岁时游观颇盛。予入蜀,往来皆过之。韩子苍舍人《泰兴县道中诗》云:‘县郭连青竹,人家蔽绿萝。’似因欧公之句而失之。此诗盖子苍少作,故不审云。” [10] (卷7, PP.87-88) 若非亲至其地,亲眼所见,则很难知晓“甘泉寺山”影入“绿萝溪”的幽邃胜境。本来略显凄凉的贬谪心境,经陆游指画,倒现出几分清绝闲雅的韵味,令人神往。至于说韩子苍过泰兴县,未解欧公本意,误以“绿萝”泛指藤萝而写入诗中,此乃惯常之失,不辩不清。

再如《入蜀记》卷三载:八月“五日,郡集于庾楼。楼正对庐山之双剑峰,北临大江,气象雄丽。自京口以西,登览之地多矣,无出庾楼右者。楼不甚高,而觉江山烟云皆在几席间,真绝景也。庾亮尝为江、荆、豫州刺史,其实则治武昌。若武昌南楼名庾楼,犹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晋特柴桑县之湓口关耳,此楼附会甚明。然白乐天诗固已云‘浔阳欲到思无穷,庾亮楼南湓口东’,则承误亦已久矣。张芸叟《南迁录》云:‘庾亮镇浔阳,经始此楼。’其误尤甚。” [11] (P.29) 陆游实地考察了江州庾楼的雄丽景观,誉之为“绝景”。继而经过仔细考辨,以为此楼之得名与晋人庾亮无关,庾亮任江、荆、豫州刺史,其治所原在武昌。因此,只有武昌的南楼“庾楼”才是“有理”的。前人

白居易、张芸叟等诗人称江州之楼为“庾楼”，都是因误传所致。

类似的文字在《入蜀记》《老学庵笔记》以及《渭南文集》中还有很多，其考订辨析的简洁片段，常似缀珠串玉，不断丰富着南宋诗学的新内涵。幸有贤者用心于此，搜辑拾掇，已成《放翁诗话》，其嘉惠后学的学术功绩足可称道。

概而言之，放翁之学得于佃、宰者为多。但从另一角度看，他毕竟生活在南宋中期，其时“新学”与“关洛之学”以及“蜀学”之间的宗派纷争已渐告消弭，“程朱”之学虽渐臻兴盛，但毕竟只是一家之说。此时的陆游能兼顾众家之长，言语之间总是表现出兼收并取的超逸心态。如《答刘主簿书》云：“不幸三二十年来，士自为畦畛甚狭，己所未知者，辄汕薄之，以为不足学，排抑沮折，惟恐不力。诋穷经者，则曰传注已尽矣；诋博学者，则曰不知无害为君子。呜呼，陋哉！夫世既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师焉，则亦各出所长，相与讲习，从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经、百氏、历代史记，与夫文词议论、礼乐耕战、钟律星历、官名地志、氏族物类之学，今四方之士，亦不可谓无人。虽不能兼该众长，要为各有所得，往往皆捐数十年之功，耗心疲力，雕悴齿发而为之，岂可易哉！”[7]（第222册，P.233）在他看来，“诋穷经”和“诋博学”都是孤陋鄙浅的表现，凡好学之士就应该“各出所长，相与讲习，从其可者，去其不可”，在讨论分析后决定取舍，而学习的范围不仅包括儒家“六经”、先秦百家之说以及历代史书，还应涉及“文词议论、礼乐耕战、钟律星历、官名地志、氏族物类”等更加广泛的领域；即使不能“兼该众长”，也要力求“各有所得”。陆游如是说，更如此做，故其文章富赡宏博，议论说理往往能出人意表。

放翁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后人欲了解其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只能仰仗相关的题跋和议论文字。譬如，在《易》学研究方面，陆游明确倡导开放而独立的作风，反对谨守一家之说。其《跋朱氏易传》云：“《易》道广大，非一人所能尽，坚守一家之说，未为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为说亦已大异，读者当自知之。”[7]（第223册，P.27）他不赞成在《周易》研究中固执己见，甚至掺杂个人好恶的举动。《老学庵笔记》云：

欧阳文忠公立论《易·系辞》当为《大传》，盖古人已有此名，不始于公也。

有黠僧遂投其好，伪作韩退之《与僧大

颠书》，引《系辞》谓之《易大传》，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论，遂为之跋曰：“此宜为退之之言。”予尝得此书石刻，语甚鄙，不足信也。[10]（卷6，P.73）

按：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三载：“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语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也。’《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谓之圣人之作，则僭伪之书也。盖夫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间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则害经惑世者多矣。”[12]（卷76，P.1121）欧阳公不仅认为《系辞》和《易大传》同书而异名，且断言两者均非“圣人之作”，不可尽信。从表面上看，欧阳公为大颠所惑，信而跋之，是因为大颠能“投其好”，在伪造的韩愈书信中将所引《系辞》内容标注为《易大传》；但实际上，陆游以为“不足信”者，并不仅仅指韩愈《与僧大颠书》的文本，或许还包括“《易·系辞》当为《大传》”的论点本身。事实上，陆游也确实没有对欧公《易》学给予太高评价。其《跋蒲郎中易老解》云：

《易》学自汉以后浸微，自晋以后与《老子》并行，其说愈高，愈非《易》之旧。宋兴，有酸枣先生以《易》名家，同时，种豹林亦开门传授，传至邵康节，遂大行于时。然康节欲以授伊川程先生，乃拒弗受，而伊川每称胡安定、王荆公《易传》，以为今学者所宜读，惟此二家。王公乃自毁其说，以为不足传，著论悔之。《易》之难知如此。夜读蜀蒲公《易传》、《老子解》，喟然叹曰：“公于《易》与《老子》，盖各自立说，迹若与晋诸人同而实异也。”书以遗其族孙申仲，试以予言请问，信何如也？[7]（第223册，P.29）

很显然，这个北宋《易》学名家的排行榜中没有欧阳修。至于放翁借程颐之口盛赞胡瑗和王安石所著《易传》，很难说没有隐含任何好恶倾向。不过，有关王安石“自毁其说，以为不足传”的事实，也的确让陆游感受到“《易》之难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围绕《易》学的理性思考还将进一步深化。开禧乙丑（1205），八十一岁的陆游在《跋

潜虚》中写道：“学者必通《易》，乃能以其绪余通《玄》；《玄》既通矣，又以其余及《虚》，非可以一旦骤得也。刘君谈《虚》如此，则其于《易》与《玄》可知矣。司马丞相乃谓己学不足知《易》，故先致力于《玄》，盖谦云耳。”[7]（第223册，P.46）今按：《玄》指《太玄》，扬雄撰；《虚》即《潜虚》，司马光著。从《周易》到《太玄》再到《潜虚》，呈现着学术探索的递进与发展，所谓“《玄》以准《易》，《虚》以准《玄》”是也。[8]（卷9《潜虚》解题，P.275）应该说，在“程朱”理学渐行渐盛的南宋中期，能够以开放姿态遍览诸家，兼收并取，陆游独立思考的严谨神态与乃祖一脉相承。

二

从《春秋后传》到《南唐书》，陆氏史学代有传人。以史学家惯有的深邃眼光观照现实社会，将借古鉴今视为历史研究的主旨和义务，时刻保持创新求真的学术自觉，乃是陆游史学著作中最值得重视的价值体现。

治《春秋》者必重其“义”，而“义”之所存并不仅限于《春秋》经传。陆佃早年“受经于王安石”，[2]（卷343《陆佃传》，P.10917）进士及第后被选为郢州教授，召补国子监直讲。荆公为相时，佃始终专心经术，未预朝政。《春秋后传》虽未传世，但陆佃承袭王氏“新学”，对“《春秋》之义”别作新解，似无可疑。如其《鹑冠子》注文，在解释《著希》篇所谓“贤人之潜乱世也，上有随君，下无直辞。君有骄行，民多讳言。故人乖其诚。能士隐其实情，心虽不说，弗敢不誉”时说：“扬雄《美新》是已。此非可已而不已者也。夫雄如此，而义不能绳墨者，则以有道故也。鲁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则无雄之道，浮沉浊世，齷齪阿上，而欲自比于雄，亦已惑矣。”其实，类似的说法，在晋人范望的《太玄经》赞中就已出现过，曰：“扬子云处前汉之末，值王莽用事，身繫乱世，逊退无由，是以朝隐，官爵不徙。昔者文王屈抑而系《易》，仲尼当衰周而述《春秋》，为一代之法，以彰圣人之符。子云志不申显，于是覃思，耦《易》著《玄》。其道以阴阳为本，比于庖牺之作，事异道同。”[13]（第265册，P.801中）范氏能将扬雄撰《太玄》之事与文王演《易》、孔子述《春秋》相提并论，以为“事异道同”，显然有悖历史真实，但类似说法却得到了宋初孙复的继承与发挥。孙氏谓当王莽篡汉之时，“独子云耻从莽命，以圣王之

道自守，故其位不过一大夫而已。子云既能疾莽之篡逆，又惧来者蹈莽之迹，复肆恶于人上，乃上酌天时行运盈缩消长之数，下推人事进退存亡成败之端，以作《太玄》”。[7]（第19册，P.304）复尝著《春秋尊王发微》，欧阳修称其“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12]（卷30《孙明复先生墓志铭》，P.458）孙氏称扬雄“以圣王之道自守”，陆佃谓扬雄“义不能绳墨者，则以有道故也”，可见其对“义”的理解默然自通。

另如，《鹑冠子·天则》篇有云：“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实者，法令放而无以臬之谓也。”佃释之曰：“臬，斩刑也。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敢为负慢而无忌惮也。虽然，秦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耳，而至于土崩，更甚乎无法者，无恻怛之实故也。由是观之，内无至诚恻怛之实，欲以一切从事于法，则将以考真也，遒足以起伪；将以稽治也，遒足以招乱。”[14]（PP.13-14）在陆佃看来，法令能否得到切实实行，关键要看它有无“至诚恻怛之实”；若无“至诚恻怛之实”，便只能停留在“文具”层面。所谓“《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者，[15]（卷10，P.258）就是要凸显“王道”不同于“霸道”的治世理念和伦理价值。王符尝云：“是故法令刑赏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尔，未足以兴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历三正之绝迹，臻帝、皇之极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兴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气，生敦庞之民，明德义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后化可美而功可成也。”[16]（《本训》，P.295）陆佃认为“欲以一切从事于法”，便足以“起伪”、“招乱”，同样是在彰显“《春秋》之义”，其基本思致应与王符等一脉相承。

陆游不治《春秋》，但所谓“圣王之道”、“《春秋》大义”，在他的史论文章中则时有体现。如《书郭崇韬传后》曰：

后唐庄宗初得天下，欲立爱姬刘氏为后。而韩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刘氏上。庄宗虽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乱，礼乐崩坏之际，然顾典礼人情，亦难其事，未知所出。群臣虽往往阿谀，亡学术，然亦无敢当其议者。豆卢革为相，郭崇韬为枢密使，崇韬功高迹危，思为自安计，而革庸懦无所为，惟谄崇韬以自安，因相与上章言刘氏当立。于是庄宗遂立刘氏为后。刘氏既立，黜货蠹

政,残贼忠良,天下遂大乱。庄宗以弑崩,李氏之子孙殲焉。呜呼!革不足言矣,崇韬佐命大臣,忠劳为一时冠,其请立刘氏,非有他心也,不过谓天子所宠昵而自结焉,将赖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实由刘氏,是亡唐者崇韬也。后唐之先,皆有勋劳于帝室,晋王克用百战以建王业,庄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内震动,几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韬顾区区之私,引刘氏以覆其社稷,而灭其后嗣。宗庙之灵,其肯赦之乎?崇韬卒以尽忠赤其族,革亦无罪诛死,岂非天哉! [7] (第222册, P.360)

郭崇韬乃庄宗功臣,梁、唐夹河对垒以及后唐灭梁之际屡建奇功,累官至枢密使。后唐同光三年(925)九月兴灭蜀之役,庄宗“以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崇韬为招讨使,军政皆决崇韬”。[17] (卷24《郭崇韬传》, P.250) 功成之后,即次年正月,郭崇韬却被魏王继岌、宦官李从袭等人矫诏杀害,其五子皆遇害。不久,庄宗“异母弟、鄆州节度使存义伏诛。存义,郭崇韬之子婿也,故亦及于祸”。[18] (卷34《庄宗纪》, P.468) 自唐昭宗天复三年(903)正月下诏诛杀宦官以后,阉寺之祸渐告消弭;五代数十年间,宦官得与后宫勾结,祸乱朝政者,仅庄宗一朝而已。郭崇韬乃朝廷重臣,其建功之后旋遭灭族,而造此无端之情状者,绝非刘氏“黷货蠹政,残贼忠良”那样简单。郭崇韬被杀之后,孟知祥入蜀割据,旋即建立后蜀政权;不久之后,唐庄宗亦被洛阳乱军所弑。假使庄宗治国有方,君正臣贤,朝纲稳固,后宫嫔妃欲与宦官串通构祸,岂容易哉! 陆游不深责于庄宗,实乃“为尊者讳”;而所谓“唐之亡,实由刘氏,是亡唐者崇韬也”的史论见解,则让人联想到石介“采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奸臣事迹”而撰写的《唐鉴》一书。该书所论“奸臣不可使专政,女后不可使预事,宦官不可使任权”的历史教训, [19] (卷18《唐鉴序》, P.211) 其实早已体现在《春秋》传笺的“微言大义”当中。

值得称道的是,陆游能将“《春秋》笔法”移诸其他文字,既隐约体现“微言大义”,又使讥刺褒贬了无痕迹。如《跋林和靖帖》云:“祥符、天禧间,士之风节文学名天下者,陕郊魏仲先、钱塘林君复二人,又皆工于诗。方是时,天子修封禅,告太平,有二人,在天下麟凤芝草不足言矣。”[7] (第223册, P.42)

魏野、林逋乃宋初名隐,他们生活在真宗时期,亲身经历过天书屡降、祥瑞日生、东封西祀等种种诡异之事。陆游若直书其事,必会因“讥讪”而获罪;今跋文称“有二人在,天下麟凤芝草不足言矣”,虽隐约其辞,然讥刺之意存焉。复如《入蜀记》卷二云:

(七月)十一日。早出夹,行大江,过三山矶、烈洲、慈姥矶、采石镇,泊太平州江口。谢玄晖登三山还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诗。凡山临江皆曰矶……采石一名牛渚,与和州对岸,江面比瓜洲为狭,故隋韩擒虎平陈,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风,辄浪作不可行。刘宾客云:“芦苇晚风起,秋江鳞甲生。”王文公云:“一风微吹万舟阻。”皆谓此矶也。矶即南唐樊若冰献策,作浮梁渡王师处。初,若冰不得志于李氏,诈祝发为僧,庐于采石。凿石为穹,及建石浮图。又月夜系绳于浮图,棹小舟急渡引绳至江北,以渡江面。既习知不谬,即亡走京师上书。其后王师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炀帝征辽,盖尝用此策渡辽水……然隋终不能平高丽。国朝遂下南唐者,实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 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献南征之策……然若冰所凿石穹及石浮图皆不毁,王师卒用以系浮梁。则李氏君臣之暗且急,亦可知矣! 虽微若冰,有不亡者乎! 张文潜作《平江南议》,谓当缚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诛之,以示天下,岂不伟哉! 文潜此说,实天下之正论也。[11] (卷2, PP.16-17)

《春秋》记事讲究“书法不隐”,而《入蜀记》有关樊若冰背叛南唐、北上献策的记载和评价,亦复如此。从赵宋皇权的角度讲,樊若冰弃暗投明、且为王师南伐出谋献策,乃是功臣。但在陆游看来,樊氏因个人偶不得志,遂起卖国投敌之念,其行为与“乱臣贼子”无异,故《记》文引张文潜议论,以为应“正其叛主之罪而诛之”,并强调说:“文潜此说,实天下之正论也。”对于“王师”渡采石灭南唐一事,陆游以为实出“天意”,樊若冰个人实无功可言。文中有关南唐君臣“暗且急”、招祸亡国实出必然的议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偏安

一隅、文恬武嬉的南宋政权。该段文字从用力挞伐樊若冰背主求荣的叛国行径,到直接批评李氏君臣“暗且怠”的亡国教训,既有历史的观照,同时也深具现实隐忧;所谓“微言大义”正隐含其中。

由于自幼受家传史学的熏陶,陆游在著史理念上始终坚持采获有据,谨严“史法”。[8](卷5《新修南唐书》解题,P.137)他不赞成欧阳修采小说入史的做法,认为不够严谨。如《老学庵笔记》云:

《该闻录》言:“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今《唐书》取其事。按尹师鲁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称:“曾祖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依钱氏,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祖光业,为吴越丞相。父璨,为元帅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东。”据此,则日休未尝陷贼为其翰林学士被诛也。光业见《吴越备史》颇详。孙仲容在仁庙时,仕亦通显,乃知小说谬妄,无所不有。师鲁文章传世,且刚直有守,非欺后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为裘美雪谤于泉下。[10](卷10,P.134)

同一事案,在《跋松陵倡和集》中又有新的表述,曰:“皮裘美当唐末遁于吴越,死焉。有子光业为吴越相,子孙业文,不坠家声。至裘美四世孙公弼,以进士起家,仕庆历、嘉祐间,为韩魏公所知,虽不甚贵显,亦当世名士也。方吴越时,中原隔绝,乃有妄人造谤,以谓裘美隳节于巢贼,为其翰林学士。《新唐书》喜取小说,亦载之。岂有是哉!比《唐书》成时,公弼已死,莫与辨者。可叹也!”[7](第223册,P.45)今按:有关皮日休陷贼之事,《新唐书》的记载不为仅见。《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壬辰载,黄巢即皇帝位后“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20](第17册,P.8241)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亦称皮日休“乾符丧乱,东出关,为毗陵副使,陷巢贼中,巢惜其才,授以翰林学士。日休惶恐,跼蹐欲死,未能劫,令作讖文以惑众,曰:‘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贼疑其裹恨必讥己,遂杀之,临刑神色自若,无知不知皆痛惋也”。[21](第3册,P.503)凡此种种,皆取《该闻录》所载而入史者,放翁独责《新唐书》,显属失察。不过,自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而征引《老学庵笔记》之考述文字,诸史旧说遂不足信。

陆游在史学研究中严考史料真伪的学术特点,由此不难得到明确的体认。

陆游专心于南唐史研究,其功夫也在于详考史实,辨伪存真。有不少细节考察,颇能体现陆氏家学求实严谨的固有特点。如《入蜀记》卷二载:

五日。大风……建康行宫,在天津桥北。桥琢青石为之,颇精致,意其南唐之旧也。晚,小雨。右文林郎监大军仓王烜来,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为七夕,盖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镇京口,六日辄先乞巧,翌旦,驰入建康,赴内燕,故至今为俗云。然大宗皇帝时,尝下诏禁以六日为七夕,则是北俗亦如此。此说恐不然。

九日。至保守、戒坛二寺。……法堂后有片石,莹润如黑玉,乃宋子嵩诗题云“凤台山亭子陈献司空,乡贡进士宋齐丘”。司空者,徐知诰也,后改姓名曰李昇,是为南唐烈祖,而齐丘为大臣。后又有题字云“升元三年奉勅刻石”,盖烈祖既有国,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显之。昇、齐丘虽皆不足道,然当攘夺分裂横溃之时,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业也。戒坛额曰“崇胜戒坛寺”,古谓之瓦棺寺。有阁,因冈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谓“钟山对北户,淮水入南荣”者;又《横江词》“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棺阁”是也。南唐后主时,朝廷遣武人魏丕来使,南唐意其不能文,即宴于是阁,因求赋诗,丕挽笔成篇,末句云:“莫教雷雨损基扃。”后主君臣皆失色。及南唐之亡,为吴越兵所焚。[11](P.11-16)

从解释南唐以七月六日作七夕的真实缘由,到叙述凤凰台所见证的南唐君臣际遇,以及瓦棺阁上曾令后主君臣失色的展宴赋诗等,都让人领略到陆游在史料占有和考订方面的严谨作风。

当天下离乱之际,史事失传或记载舛误者难以避免,后世史家坐拥诸书详加考绎,方能察其真伪。陆游尝云:“史之失传者多矣。廖偃、彭师曷之事,可谓尽忠所事者,而《五代史》则以为马希崇遣师曷偃囚希萼,而师曷奉希萼为衡山王,是偃同受囚希萼之指,而师曷独能全之也。《江

表志》则以为师曷且从希崇害希萼,偃百计诱渝而寝其谋,及卫希萼也,师曷之计乃无所施。是师曷实欲害希萼,独赖偃以全耳。呜呼!何其异也!惟《十国纪年》言两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之。大抵忠于故君两人实同,而偃功为多,不可诬也。张巡、许远之事,著如日星,两家子弟犹有异论,况偃师曷耶?”[22](卷11,P.259)毫无疑问,陆游研究南唐史的成功,首先体现在一丝不苟的细节考察上。

陆氏家学谨严“史法”的基本特点,在陆游《南唐书》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该书仿照《史记》等正史体例,《纪》《传》安排规范合理,相关议论则往往能超越前贤,鞭辟入里。

先看体例。陆游之前,撰南唐史者有马元康及其孙马令、胡恢两家,而马氏《南唐书》独得传世。马氏祖孙撰写此书意在“诛乱尊王”,马令《南唐书序》称:“予作此书,尊天子于中原,而僭伪之事则不为南唐讳者,岂无意哉?盖尊天子所以一天下之统,书其僭所以著李氏之罪。其统既一,其罪既著,则窃土贼民者,无遁刑于天下后世矣。”[23](P.5284)为了实现这样的撰述宗旨,其书除了为南唐三主撰《书》外,还设有“女宪”、“宗室”、“义养”、“儒者”、“隐者”、“义死”、“廉隅”、“苛政”、“诛死”、“党与”、“归明”、“方术”、“谈谐”、“浮屠”、“妖贼”、“叛臣”及“灭国”等《传》,名目繁多,体制颇显零乱。

陆游新撰《南唐书》体例严谨,超越了胡、马两家。其书为南唐三主撰《纪》,陆游为此解释说:“昔马元康、胡恢皆常作《南唐书》,自烈祖以下,元康谓之书,恢谓之载记。苏丞相颂得恢书而非之,曰:‘夫所谓纪者,盖摘其事之纲要系于岁月,属于时君。秦庄襄王而上与项羽,皆未尝有天下,而史迁著于《本纪》,范曄《汉书》又有皇后纪。以是质之,言纪者不足以别正闰。陈寿《三国志》,吴、蜀不称纪,是又非可法者也。’苏丞相之言,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下皆为纪,而用史迁法,总谓之南唐纪云。”[22](P.5471)南唐立号建国,皇祚传承有序,其有国之君依例当撰本纪。马令、胡恢因其“僭伪”,故曰书或载记,殊不知五代十国政权皆为偏霸之邦,若“僭伪”之君皆不得为纪,则其时无不“僭伪”者。且南唐“虽为国褊小,观其文物当时诸国莫与之并”,“唐末契丹雄盛,虎视中原,晋汉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谨顾。乃独拳拳于江淮小国,聘使不绝,

尝献橐驼并羊马千计。高丽亦岁贡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余风,以唐为犹未亡也”; (赵世延《南唐书序》,四部丛刊初编本《陆氏南唐书》卷首)当五代乱离之世,南唐政权受到的礼遇显然比中原更多。此外,朱熹尝撰《资治通鉴纲目》,即大书“开宝八年”,以为北宋正统之始。其“凡例”曰:“凡天下混一为正统。正统者,大书纪年继世,虽土地分裂,犹大书之。其非一统,则分注细书之;虽一统而君非正系,或女主,亦分注书之。”明人周礼《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则发明朱熹之言曰:“宋建隆初曷为分注其年号,而此大书何?天下未一,宋亦列国耳,故细书之。”由此观之,陆游不受“中原正统”理念的束缚,明确为南唐三主立《纪》,完全符合著史规范。

陆游《南唐书》“列传”部分的考述援据精详,简实严谨,处处体现着去伪存真的“史法”自觉。该部分虽较马令《南唐书》少十卷,内容安排却更加合理。譬如,马令《南唐书》设“党与传”,理由是“南唐之士,亦各有党,智者观之,君子、小人见矣。或曰宋齐丘、陈觉、李征古、冯延巳、延鲁、魏岑、查文徽为一党,孙晟、常梦锡、萧俨、韩熙载、江文蔚、钟谟、李德明为一党”。[23](P.5387)然该《传》所列仅宋齐丘、陈觉、李征古、冯延巳、延鲁、魏岑、查文徽等七人而已。在马氏看来,宋齐丘等人“一入于党与”者“则宜无君子”,而孙晟等“各著于篇者,未必皆小人”。[23](P.5387)马氏之《书》撰成于宋徽宗崇宁年间,其作者长期生活在朋党倾轧的政治氛围中,对以“君子小人之辨”为核心的朋党理论非常熟悉。其专设“党与传”,目的就是要让宋齐丘、冯延巳等“小人”之党承担南唐政权由盛转衰、直至亡国的历史责任,借以警世。及陆游重撰《南唐书》,其检讨角度已有很大变化,所谓朋党之争不再是关注重点。陆游虽然对宋齐丘“特好权利,尚诡譎,造虚誉,植朋党,矜功忌能,饰诈护前,富贵满溢,犹不知惧。狙于要君,暗于知人,衅隙遂成,蒙大恶以死”的奸佞品行了如指掌,且云:“齐丘之客,最亲厚者陈觉,元宗亦以为才。冯延巳、延鲁、魏岑、查文徽与觉深相附结,内主齐丘,时人谓之五鬼。”[22](卷4《宋齐丘传》,P.5497,5496)但论及此人与南唐盛衰的关系,其客观公允的态度实在马令之上。《宋齐丘传》后论曰:“世言江南精兵十万,而长江天堑可当十万,国老宋齐丘机变如神,可当十万。周世宗欲取江南,故齐丘以反间死。方五代之际,天下分

裂大乱,贤人君子皆自引于深山大泽之间,以不仕为得。而冯道有重名于中原,齐丘擅众誉于江表,观其人,可以知其时之治乱矣。周师之犯淮南,齐丘实预议论,虽元宗不尽用,然使展尽其筹策,亦非能决胜保境者。且世宗岂畏齐丘机变而间之者哉?盖钟谔自周归,力排齐丘,杀之,故其党附会为此说,非其实也。”[22](P.5498)钟谔使周返回江南后,遂力排宋齐丘而杀之,此乃客观事实。至于宋氏可当精兵十万之说是否出自敌党附会,未见明证,但朋党倾轧造为飞语也不是没有可能。既然两党诸人各有功罪,像马令那样专为宋齐丘等人设“党与传”,而将江南灭国之罪尽皆归之的做法就显得有些偏颇。有鉴于此,陆游《南唐书》对所有立传者皆一视同仁,不再设“党与传”。

撰史者各有立场,倘若不能充分尊重撰述对象的“主体”地位和价值,欲著为信史,常不可得。马令《南唐书》所谓“义死”、“诛死”、“归明”、“叛臣”等传,坚守中原“正统”理念,而斥南唐文臣“生草昧之世,事偏据之国,君臣上下,冥行而已矣”。[23](P.5399)撰史立场既已偏颇,观照重点便难免模糊。陆游重修南唐史,虽然也有对“天下大势”的充分观照,但尊重南唐政权本身的盛衰得失,充分彰显其“当时诸国莫与之并”(赵世延《南唐书序》)的文化成就,乃是其重点所在。若能取马、陆两家《南唐书》“列传”文字比较对读,其高下差异实不待智者而辨矣。

再谈史论。陆游《南唐书》本着“录其实”,使后之“览者得详焉”的宗旨,[22](P.5498)对南唐近四十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人物详加考察,知人论世之中不乏真知灼见。为避免冗繁,兹略举两例。

其一,北宋史家评说南唐盛衰之迹,总是先将矛头指向元宗发动的闽、楚之役,以为此役劳民伤财,致使南唐兵力耗丧,国力衰减;及周世宗帅师南牧时,李氏政权遂无力抵抗,仓促之中只能坐失江北之地。如马令即云:“元宗即位一十九年,有经营四方之志,约己慎刑,勤政如一。向非任用群小,屏弃忠良,国用不殫于闽楚,师旅不弃于淮甸,则庶几完成之君也。”[23](P.5287)对此,陆游却另有看法。他说:“元宗举闽、楚之师,境内虚耗。及契丹灭晋,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国用既已弗支,熟视而不能出,世以为恨。予谓不然。唐有江淮,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且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也。若用得

其人,乘闽、楚昏乱,一举而平之,然后东取吴越,南下五岭,成南北之势,中原虽欲睥睨,岂易动哉!不幸诸将失律,贪功轻举,大事弗成,国势遂弱,非始谋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且陈觉、冯延鲁辈用师闽、楚,犹丧败若此,若北向而争天下,与秦、晋、赵、魏之师战于中原,角一旦胜负,其祸可胜言哉!”[22](P.5484)与此同时,对南唐军纪涣散、赏罚无状的过失和责任,陆游也作了极为合理的分析,曰:“亡国之君,必先坏其纪纲,而后其国从焉。方是时,疆场之臣非皆不才也,败于敌,未必诛,一有成功,谗先杀之,故强者玩寇,弱者降敌,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陈觉、冯延鲁、查文徽、边镐辈,丧败涂地,未尝少正典刑。朱元取两州于周兵,将遽之,时固未为隳功,而陈觉已不能容,此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诸将束手无策,相与为俘累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于周。虽未即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当于是观之。”[22](P.5561)客观说来,陆游肯定元宗发动闽、楚之役的动机,分析南唐军事失败的原因,充分显示了超越凡俗的睿智和胸怀。假如元宗果真能像陆游所说的那样,平闽、楚,取吴越,南下五岭,统一南中国地区,与中原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南唐政权的兴衰也许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全新轨迹。

其二,有关南唐君臣际遇关乎国运兴衰的讨论,向来深受史家重视。其最普遍的说法是:李氏三朝君疑臣危,离心离德;志士仁人不能有为于苟安之邦,高节重义无存乎离乱之世;谗佞之徒结党乱政,忠勇之士祸难相寻。如马令《南唐书》即云:“南唐享国日浅,可名之士无几,而诛死太半。如宋齐丘、陈觉、李征古、李德明、钟谔、张昞、褚仁规、王建封、范冲敏、皇甫继勋、林仁肇、潘佑、李平,皆死于非命。就其未死之行以考之,则知其所死者不能无当否矣。然则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为国而自去其股肱,譬诸排空之鸟,而自折其羽翮,孰有不困者哉!”[23](P.5381)类似的说法虽有所依据,但置评者毕竟远离那个特殊的环境,难免主观臆测,人云亦云。而陆游那样的南唐史专家,由于史料搜检翔实完备,因而能站在江南君臣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们,并给予公允合理的分析和评价。如其曰:

南唐之衰,刘仁赡死于封疆,孙忌死于奉使,皆天下伟丈夫事,虽敌仇不敢议也。区区江淮之地,有国仅四十年,覆亡

不暇,而后世追考,犹为国有人焉。盖自烈祖以来,倾心下士,士之避乱失职者,以唐为归。烈祖于宋齐丘,字之而不敢名,齐丘一语不合,则挈衣笥望秦淮门欲去,追谢之乃已。元宗接群臣,如布衣交。间御小殿,以燕服见学士,必先遣中使谢曰:“小疾不能着帻,欲冠褐,可乎?”于呼,是诚足以得士矣。苟含血气,名人类者,乌得不以死报之耶!《传》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诎不信夫! [22] (PP. 5554 - 5555)

他不仅充分肯定了南唐之君倾心下士、江南群臣以死相报的客观史实,且深入揭示了南唐三主足以得士的内在原因。

南唐文臣因忠谏而被杀者首推潘佑,后主终身后悔,至死叹息者亦为此事耳。佑在江南颇受礼遇。“后主在东宫,开崇文馆以招贤士,佑预其间。后主嗣位,迁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议纳后礼,援据精博,合指,迁知制诰。召草南汉主书,文不加点,后主咨赏,迁中书舍人,每以潘卿称之而不名。”[22] (P. 5565) 其后以直谏被杀,世称其冤。但陆游对此却另有议论,曰:“佑学老、庄,齐死生,轻富贵,故其上疏,纵言诋訾,若惟恐不得死者,虽激于一时忠愤,亦少过矣。后主非强愎雄猜之君,而陷之于杀谏臣。使佑学圣人之道,知事君之义,岂至是哉! 不幸既死,同时诸臣已默默为降虏矣,犹丑正嫉贤,视之如仇,诬之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为人妖,虽后之良史,有不能尽察其说者,于戏悲夫!”[22] (P. 5566) 平心而论,潘佑以自刭死,确实有违“事君之义”,以此深责后主,谓其自去“股肱”,亦言之太过。

如果说陆氏家学对“《春秋》大义”的理解和阐释必然会对陆游史学研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以南宋偏安政权为参照的治史心态,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陆氏《南唐书》对李氏政权盛衰之迹的分析和理解。陆游的南唐史研究延续了陆氏家学严谨求实的一贯作风,在史料考订方面一丝不苟。与此同时,其学术判断也往往超越凡俗,论说之际总会拓展出一些理性而公允的新维度。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陆游《南唐书》的反思与设想却让人回味无穷。

三

经史之学与散文创作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在

陆游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陆子适为乃父文集撰序,云:“先太史之文,于古则《诗》《书》《左氏》《庄》《骚》《史》《汉》,于唐则韩昌黎,于本朝则曾南丰,是所取法。然禀赋宏大,造诣深远,故落笔成文则卓然自为一家,人莫测其涯涘。”[4] (P. 1) 此虽为溢美之词,亦可见出陆游平生崇尚效法文学经典,及其所渴望达到的古雅境界。从家学传统影响和制约散文创作的角度看,陆游以经、史考论为文,在“国是”讨论中始终体现“《春秋》之义”;文辞虽简赅,却不掩学识之富赡,胸襟之超迈。

在散文创作过程中,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透露经史研究的某种习惯,这在两宋作家中极为常见。而像陆游那样,既深受家学熏陶,又能自造宏远的硕儒名公则更是如此。

《渭南文集》中有不少文章颇具学术探索的严谨韵致。其中有追记历史事件而不意成文者,如卷三一《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云:

某按:唐昭宗乾宁四年,遣中使焦楚鎰赐吴越武肃王铁券,以八月壬子至国。是岁,武肃始兼领镇东节,出师大败淮南兵十八营,定婺、睦、苏、湖州,而铁券适至,盖其国始盛时也。及忠懿王入朝,以其先王所藏玉册铁券,置之祖庙,不敢以自随。淳化元年,杭州悉上之于朝。时忠懿王已薨,太宗皇帝复以册券赐王之子安僖王惟浚。安僖王薨,券归文僖公惟演。文僖公薨,券传仲子霸州防御使晦。霸州侍仁宗皇帝燕闲,帝问先世所赐铁券,欲见之。霸州并三朝御书以进,帝为亲识御书之末,复赐焉。文僖之孙开府公景臻,尚秦鲁国大长公主。某年十二三时,尝侍先夫人,得谒见大主,铁券实藏卧内,状如简瓦。今七十余年,乃得见录本于武肃诸孙樵家。后十字,盖文僖手书。某家旧藏文僖书帖,亦有押字,皆与此同。武胜军节度使印,则文僖尹洛时所领邓州节钺也。[7] (第223册, P. 57)

跋文追记唐昭宗赐武肃王钱鏐铁券的传递线索极为清晰。它既是一段完整翔实的历史资料,又是一篇简洁雅致的记叙文。小小铁券,不仅承载着吴越钱氏受宠于唐宋两朝、且割据称雄的赫赫功勋,也彰显出宋太宗和仁宗皇帝大度有容的胸襟。文字简洁而清晰,叙述有条不紊,体现了陆

氏文风的固有特点。

作为当代名家,陆游将经史研究的所见所得用于文章写作,形成了一种自觉严谨的创作习惯。例如,其《吕居仁集序》曰:“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来自蛮夷荒忽辽绝之域,累数万里,而后至中国,以注于海。今禹之遗书,所谓岷积石者,特记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于是也。故《尔雅》谓河出昆仑墟,而传记又谓河上通天汉。某至蜀,穷江源,则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断壤绝,不复可穷。河江之源,岂易知哉!古之学者,盖亦若是。惟其上探伏羲唐虞以来,有源有委,不以远绝,不以难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后世而无愧。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7](第222册,P.340)放翁为吕本中集作序,却远述天下大川皆源自蛮夷荒忽辽绝之域,虽有譬喻本中“自少时既承家学”,后为“一时学士宗焉”的用意,但毕竟离题较远,用字太多。假如不是习惯使然,类似现象恐怕很难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放翁集中有一些文章形同札记,或拾遗补缺,或改错纠谬,不一而足。如卷三〇《跋米元晖书先左丞海岱楼诗》云:“右米侍郎元晖书先大父《题海岱楼》诗一首。《春秋公羊传》曰:‘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尔。’故大父云:‘起为霖雨从肤寸。’盖言遍雨天下之泽,自肤寸而始也。米所书,误以‘从’为‘成’,遂失本意,可为太息。”[7](第223册,P.40)虽然仅一字之差,放翁也能引经据典以正之,足见其充分尊重“《春秋》谨严”的真正涵义。[24](卷558,韩愈《进学解》,P.2501)同样的文字在《入蜀记》和《老学庵笔记》中俯拾皆是,只不过绝大多数读者并未将其视为“文章”。如《入蜀记》卷四载:

(八月)二十六日。与统舒同游头陀寺。……

藏殿后有南齐王简栖碑,唐开元六年建,苏州刺史张庭圭温玉书,韩熙载撰碑阴,徐锴题额,最后云:“唐岁在己巳,武昌军节度观察留后、知军州事杨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县主簿、秘书省正字韩夔书碑阴云:“乃命犹子夔正其旧本而刊写之。”以是知夔为熙载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后一手,又作“温”字不全,盖南唐尊徐温为义祖而避其名,则此碑盖夔重书也。碑阴又云:“皇上鼎

新文物,教被华夷,如来妙旨,悉已遍穷,百代文章,罔不备举,故是寺之碑,不言而兴。”按此碑立于己巳岁,当皇朝之开宝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尔。熙载大臣,不以覆亡为惧,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华夷,固已可怪!又以穷佛旨、举遗文及兴是碑为盛,夸诞妄谬,真可为后世发笑。然熙载死,李主犹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惑如此,虽欲久存,得乎?

……

简栖为此碑,骈俪卑弱,初无过人,世徒以载于《文选》,故贵之耳。自汉、魏之间,骈俪为此体,极于齐、梁,而唐尤贵之,天下一律。至韩吏部、柳柳州大变文格,学者翕然慕从,然骈俪之作终亦不衰。故熙载、锴号江左辞宗,而拳拳于简栖之碑如此。本朝杨、刘之文擅天下,传夷狄亦骈俪也。及欧阳公起然后扫荡无余,后进之士虽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读不能终篇,已坐睡矣,而况效之乎?则欧阳氏之功可谓大矣。若鲁直云“唯有简栖碑,文章岿然立”,盖戏也。[11](卷4,PP.38-39)

此文先述石城山头陀寺的地理位置和周边形胜,颇有寥落之感。次及南齐王简栖碑,引韩熙载所撰碑阴文字,以为南唐危蹙之时,君臣不惧覆亡,反以穷佛旨、举遗文、兴古碑为盛事,夸诞妄谬,贻笑后世。文章最后简述骈俪之作的演变史程,谓此体成于汉、魏,极于齐、梁,贵于李唐。韩熙载、徐锴号江左辞宗,杨亿、刘筠以文擅天下,也不过长于骈体俪作。直到欧阳修奋起扫荡,骈俪之作才日渐近古。一篇不到八百字的记游文字,既有对江山兴废与地名沿革的考察,又有对江南君臣和骈俪文体的议论,考述严谨,层次清晰,开阖自如,宏阔大气。像这样宛如俯拾的优雅力作,若没有博瞻厚重的知识积累,很难一蹴而就。

有一些闻见琐记,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用心良苦,若细心品读,则耐人寻味。如《老学庵笔记》卷三载:

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其间数言信中之者,盖范寥也。高宗得此书真本,大爱之,日置御

案。徐师川以鲁直甥召用,至翰林学士。上从容问信中谓谁。师川对曰:“岭外荒陋无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时为福建兵钤,终不能自达而死。

范寥言:鲁直至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寺,法所不许,乃居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10](卷3,P.33)

该文所记载的是黄庭坚不为人知的凄怆晚景,及其最后一个贫寒挚友。上段谓黄氏《家乘》数言“信中”者,无人知为范寥也。下段先饱蘸浓墨,叙写黄山谷贬居宜州时的困厄情状;紧接着通过一个戏剧性情节,用“以乐景写哀”的方式,精心勾画了“江西诗祖”颓然辞世前的音容笑貌,那句“吾平生无此快也”的告白乃是黄鲁直临终的叹息,留给世人的印象幽婉而凄凉!

上引两篇看似随意的精妙之作,或许只有长期致力于经史研究的博雅之士才能在潜意识作用下创作出来。宋人“笔记”多似“小说”,但像《老学庵笔记》那样“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的严谨著作,却能保持经史研究的惯常状态;凡作者心目之所及,即可征引考述,构架成文。而序、跋、游记等篇幅短小的文章,更适合作者施展才学,对相关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考述品评。经史研究之于散文创作,其关联互通的学理逻辑正在于此。

学以致用的追求和原则,在渭南文章中同样有所体现。陆游以为在“六经散缺不全,而诸子之书,则往往具在。又其辞怪伟辩丽,足以动荡世之耳目”的现实情景下,欲使“学者之文辞一合于道,而不悖戾于经”是极其困难的,[7](第222册,P.348)但只要法“古”守“正”,“重其身而养其气”,就能发挥所学,运用于当下。

有道者始能尽文章之妙,这是包括陆游在内的许多宋代硕儒普遍秉持的观点。绍兴三十一年(1161),三十五岁的陆游在《上执政书》中这样写道:

某小人,生无他长,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遗文,先秦古书,昼读夜思,开山破荒,以求圣贤致意处,虽才识

浅暗,不能如古人迎见逆决,然譬于农夫之辨菽麦,盖亦专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别如是,机杼如是,边幅如是,自六经、《左氏》《离骚》以来,历历分明,皆可指数。不附不绝,不诬不素,正有出于奇,旧或以为新,横骛别驱,层出间见。每考观文词之变,见其雅正,则纓冠肃衽,如对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则脱帽大叫,如鱼龙之陈前,巢卢之方胜也。间辄自笑曰:“以此娱忧舒悲,忘其贫病,则可耳。持以语人,几何其不笑且骂哉!”诚不自意,诸公闻之,或以为可。书生所遭如此,虽穷死足以无憾矣。然师慕下风,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遽宁。恭惟明公道德风节,师表一世,当功名富贵之会而不矜,践山林钟鼎之异而不变,非大有得于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与至道同一关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尽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贱且愚,而愿有闻于左右也。[7](第222册,P.228)

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有效师法古圣前贤的方法和途径,即以“不附不绝,不诬不素”的态度,倾心品读包括“六经、《左氏》《离骚》”在内的“上世遗文,先秦古书”,仔细寻绎“圣贤致意处”。在他看来,文辞的“雅正”与“怪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与“至道”表里相关,“惟天下有道者,乃能尽文章之妙”。文学批评史家很少注意到陆游的这篇文章,其实该文有关“法古”途径及“文”、“道”关系的讨论,公正平和,值得重视。

关于“养气”,陆游反复强调“真”与“正”,竭力反对“伪”和“妄”,以为人之邪正,完全可以通过其文章来分辨洞察。如其《上辛给事书》即以为君子有文,必有是实,“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而所谓“文”者,不必鸿篇巨制,“残章断稿,愤讥戏笑,所以娱忧而舒悲者”,只要“苦心致力”之所为,均应受到重视。“中正闳博”的文章乃是作者“气全力余”的外在表达,故绝难“容一毫之伪于其间”。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但重身养气者不必迎合世俗潮流,更不能让自己沦为“以浮文眩世”的“庸人”。[7](第222册,P.230)

通过“法古”和“养气”提升文章的精神内涵固然重要,但学以致用最高境界并不在此。《渭南文集》中有不少文章,既可见出经史之学的相关背景,又能与国家兴衰密切结合,其高尚超逸的人格境界令人叹赏。陆游一生仕宦虽不甚显达,但发挥所学,积极建言,奋不顾身,足有可瞩目者。如《渭南文集》卷二五《书渭桥事》云:“陆某曰:河渭之间,奥区沃野,周、秦、汉、唐之遗迹隐鳞故在。自唐昭宗东迁,废不都者三百年矣。山川之气,郁而不发。艺祖、高宗皆尝慨然有意焉,而群臣莫克奉承。予得此事于若思之孙逸祖。岂关中将复为帝宅乎?夷暴中原,积六七十年,腥闻于天。王师一出,中原豪杰必将响应,决策入关,定万世之业,兹其时矣。予老病垂死,惧不获见,故私识若思事以示同志,安知士无脱挽辂以进说者乎?”[7](第223册,P.148)陆游自幼熟读地志,故其有关恢复中原、建都关中的设想,必与所学息息相关。当南宋朝野苟且偷安之时,陆游独以老病之身进建此言,其豪情壮志绝非庸夫俗子可比。

同样的精神在《蜡弹省札》《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及《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中也有所体现。如《上二府论事札子》就大理寺奏北界蒙城县官邢珪“侵犯边城,杀害义旅”一事提出议论,以为“有司谨守律令,朝廷当断以大义”。“邢珪生于涿、易,非祖宗涵养之人;仕于伪界,非国家禄使之吏。身有官守,一旦危急,力虽不及,犹能死守,虽懵于逆顺,不知革面,然《春秋》之义,天下之善一也。若遂诛之,恐非所以劝天下之为人臣者。”[7](第223册,P.199-200)其实,类似的观点在《前汉纪》中就已出现过,其作者荀悦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书》曰:‘西戎即序,言皆顺从。’其序也,道理辽远,人物介绝,人事所不至,血气所不沾,不告谕以文辞,故正朔不及,礼义不加,非导之也”;“若以权时之宜,则异论矣”。[25](第104册,P.140上)陆游所谓“朝廷当断以大义”,宽赦邢珪之罪,目的也在于通过“以权时之宜”,规劝那些“仕于伪界”的人臣,使其能知“大义”。

陆游的议论文章经常将西汉“文、景之治”、李唐“贞观之治”与仁宗朝的太平盛世相提并论,希望南宋朝廷能有所取法。其《上殿劄子》曰:“臣窃观周自后稷、公刘以来,积德深远,卜世长久。为之子孙者,宜皆取法焉。然而独曰‘仪刑

文王’,又曰‘仪式刑文王之典’。汉自高帝创业,其后嗣亦多贤君,然史臣独曰:‘汉言文、景,美矣!’至武帝之功烈,犹以不遵文、景之恭俭为恨。唐三百年,一祖三宗,皆号盛世,而太宗《贞观政要》之书独传,宝以为大训。元祐中,学士范祖禹亦曰:‘祖宗畏天爱民,子孙皆当取法。惟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诚能专法仁宗,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呜呼!祖禹之言,天下之至言也。”[7](第222册,P.202)如果说“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还仅仅是一种令人神往的历史记载,那么“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试,休养生息,日趋于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于其时者,谈笑佚乐,无复向者幽忧不平之气”的富盛与祥和,[7](第127册,P.270)则更具现实说服力。学以致用最佳途径,也许并不是向困惑的人群讲述那些永远难以企及的历史辉煌,而是尽可能多地提醒他们太平盛世其实并不遥远。陆游以其豁达超迈的文章议论,让世人看到了走出阴霾的希望,获得了改造现实的勇气。

坚守陆氏家学的固有传统,以兼收并取的开放胸怀品评唐宋两代的著名作家,全面呈现独立自主的审美判断,充分展示文学研究的丰富细节,这为陆游文章“卓然自为一家”[4](P.1)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保证。

宋人有关科举与文学、“时文”和“古文”的议论纷争由来已久,其是非曲直很难判断。陆游虽非科举出身,也不能不面对同样的困惑。但相对于那些全盘否定科举和“时文”的理学家,陆游的观点显然要客观和公允得多。其《答邢司户书》云:

某辱赐书,及圣人之道与古作者之文章,又以世之称师弟子而徒事科举、求利禄者为羞。卓乎伟哉!非某所敢仰望万一也。某少之日,学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于道,亦未敢谓得也。身且弗给,而何以及人?及庸众人且弗能,其况有以助足下乎!惶恐,惶恐。虽然,足下顾我厚,某其敢有所弗尽。吾曹有衣食祭祀婚嫁之累,则出而求禄,恐未为非;既不免求禄,则从事于科举,恐亦未为可憾。科举之文,固亦尊王而贱霸,推明六艺而诵说古今。虽小出入,要其归亦何负于道哉?若言之而弗践,区区于口耳,而不自得于心,则非

独科举之文为无益也。近时颇有不利场屋者，退而组织古语，剽裂奇字，大书深刻，以眩世俗，考其实，更出科举下远甚，读之使人面热。足下谓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仆辈，安能欺足下哉！故自科举取士以来，如唐韩氏、柳氏，吾宋欧氏、王氏、苏氏，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举之士也。此无他，徒以在场屋时，苦心耗力，凡陈言浅说之可病者，已知厌弃，如都市之玉工，珉玉杂治，积日既久，望而识之矣，一旦取荆山之璞，以为黄琮苍璧万乘之宝，珉其可复欺耶？凡今不利场屋而名古之文者，往往多未尝识珉者也，又安知玉哉？乃如足下识之可识精矣，当弃珉剖玉而已。至于圣人之道，足下往昔朝夕所讲习者，岂外于是？言之而必践焉，心之而不徒口耳焉，无余道矣。[7]（第222册，P.231）

针对“世之称师弟子而徒事科举、求利禄者为羞”的常见论调，陆游以为世人为生计所累出而求禄，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既求禄仕，则难免要“从事于科举”，常情常理，又何必为此感到羞愧或失望呢。至于说科举之文有悖“圣人之道”，“不自得于心”，陆游以为这样的认识值得商榷。在他看来，科举之文“尊王而贱霸，推明六艺而诵说古今”，固无负于儒道；且唐宋许多名公圣手都曾经历场屋，“苦心耗力”，方成大器。应该说，在理学称盛的时代，此番议论所呈现的理性逻辑值得尊重。

陆游虽充分肯定欧阳修变革文风的历史功绩，但他并不主张反骈重散，而是尊重各种文体的特点和功用。譬如，王珪历仕仁、英、神宗三朝，以文章致位通显，“掌文诰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传诵之”；[26]（第153册，叶清臣《王文恭公神道碑》，P.658上）其文“多而且工者，以骈俪之作为最，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3]（卷152《华阳集》提要，P.1314中）夏竦“幼负才藻，超迈不群”，[27]（P.48）其所为文章“闳衍瑰丽，殆非学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册，屡以属之，其誉满天下”。[7]（第53册，王珪《夏文公竦神道碑铭》，P.199）王铎《四六话》卷上云：“先公言：本朝自杨、刘四六弥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气，至英公表章，始尽洗去。四六之深厚广大，无古无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谓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元厚之四六，皆出于英公；王荆公虽高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义理

而已。”[28]（P.2）他们虽以富赡博雅的骈偶俪文获誉当时，却无法得到两宋文学评论家的赞扬与肯定。然而，陆放翁熔经史之学而铸为文章，对上述诸公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称“王岐公文章闳丽，有西汉风”，[7]（第222册，P.390）其高妙之处绝非“不利场屋而名古之文者”所能及。《老学庵笔记》卷七云：“夏文庄，初谥‘文正’，刘原父持以为不可，至曰：‘天下谓竦邪，而陛下谥之正。’遂改今谥。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温厚粹深，天与其正。’盖谓夏公之正，天与之，而人不与。当时自有此一种议论。故张文定甚恶石徂徕，诋之甚力，目为狂生。东坡《议学校贡举状》云：‘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其言亦有自来。欧公作《王洙源叔参政墓志》曰：‘夏竦卒，天子以东宫恩赐谥文献。洙为知制诰，封还曰：此僖祖谥也。’于是太常更谥文庄。与他书异。”[10]（PP.93-94）今按：夏竦与石介因《庆历圣德诗》而引发的公案，折射出北宋党争的诸多内在隐情。欧公亲历其事，悉知真相，其文以驳谥之事归之王洙，未详所据。放翁特引宋子京祭文及东坡《议学校贡举状》，以为“夏公之正，天与之，而人不与”者，盖为夏竦辨屈也。

此外，陆游《书空青集后》云：“建中靖国元年，景灵西宫成，诏丞相曾公铭于碑，以诏万世。碑成，天下传诵，为宋大典，且叹曾公耆老白首，而笔力不少衰如此。建炎后，仇家尽斥，曾公文章始行于世，而独无此文。或谓中更丧乱，不复传矣。淳熙七年，某得曾公子宝文公遗文于临川，然后知其宝文公代作，盖上距建中八十年矣。呜呼！文章巨丽闳伟至此，使得用于世，代王言，颂成功，施之朝廷，荐之郊庙，孰能先之。而终宝文公之世，士大夫莫知也。”[7]（第222册，P.360）按：建中靖国元年居相位者乃曾布也，而所谓“曾公子宝文公”者，即曾布之子纘。曾布与曾巩、曾肇都是“南丰曾氏”的重要成员。陆游偶读曾纘代其父所撰碑文，即深叹其巨丽闳伟，感佩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在自幼饱受家学熏陶的陆游看来，能够熔铸事典，将富赡渊博的学识施于文章写作，其本身并无可指责。富实典雅的骈文远比“组织古语，剽裂奇字，大书深刻，以眩世俗”[7]（第222册，P.232）的“古文”好得多。

创作主体的学识修养不同，审美取向必然各异；陆游讥李白浅陋似索客，即其例也。《老学庵笔记》卷六云：“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

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不熟者,妄立此论耳。《四家诗》未必有次序,使诚不喜白,当自有故。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金锁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集中此等语至多,世俱以其词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亲”,宜其终身坎壈也。”[10](P.79)虽说唐人作诗多以“兴趣”为主,“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29](P.688)但这在习惯了“以学问为诗”的宋人看来,的确有些异样。放翁谓李白“识度甚浅”,盖由其崇尚博雅的审美取向使然。

当然,强调博学有见识,并不意味着所有诗作都必须“字字有来处”,毕竟学识积累和艺术创作的价值指向并不相同。陆游“读书多,立言慎,于古人著作非果援据该博,商订详审,不敢轻著一语”,[30](卷85《跋渭南文集》,P.430下)这既是陆氏家学的传统,更是陆游撰述的基本特点。正因为有着如此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陆游才对时人注解杜诗、苏诗等心存怀疑。《老学庵笔记》卷七云: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崑酬倡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10](P.95)

其实,笺注杜诗的动作与宋代诗家过分讲求“无一字无来处”[7](第104册,P.301)的审美需求是密切相关的。就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而言,欲“字字寻得出处”的笺注者肯定要违背“少陵之意”;但如果不详加注释,宋人又很难了解其作为艺术“经典”

的权威所在。同样的困惑,在苏轼诗歌的注释和理解中同样存在。钱谦益《吴江朱氏杜诗辑注序》云:“范致能与陆务观论注苏诗,务观以为难,枚举数条以告,致能曰:‘如此则诚难矣。’厥后吴兴施宿武子注成,务观遂举斯言以为序。余读渭南之书,窃闻注诗之难,淳复以告学者,老而失学,不敢忘也。”[31](P.124上)宋人以学问为诗,故注诗之风与日俱盛。但在陆游看来,能妙绝古今的大家名作,往往缘于即兴而来的意象情趣,作者的灵感动机是绝难通过“字字寻得出处”的办法获得理解的。放翁既是饱受家学熏陶的学者,同时也是名列“南宋四大家”的著名诗人,也许只有他才能真正理解“学问”关乎创作的深层思致。经史之学虽然有助于提高作者的“识度”,却不能直接转化为动人心脾的诗文作品;而对真正高水平的诗文作品,也不可能通过精准无误的字句注释得到深层理解。

总之,陆游散文创作中隐约透露的某些经史研究习惯,是同一主体扮演的两种角色在彼此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自然现象;无论序、跋还是用心良苦的琐记,都让人真切感受到经史研究与散文创作之间的深层联系。而在“学术”与“文章”的共同作用下,陆游将法“古”守“正”看作学以致用的基本前提,在他看来,只要“重其身而养其气”,就能使“学者之文辞一合于道,而不悖戾于经”,为时所用。客观说来,陆游确实用豁达超迈的议论文章,给世人带来了走出困惑的希望。作为陆氏家学的优秀传人,陆游以兼收并取的态度阅读和品评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曾巩等唐宋名家的诗文作品。他从未否定科举取士制度的合理性,也没有将“科举之文”与“古文”对立看待。他偏好散文,却并不否定骈辞俪文的价值;至于讥笑李白诗“浅陋有索客之风”,则是博学雅士无意之间透露出的审美判断。虽然身在“以学问为诗”的时代,但陆游并不赞成“无一字无来处”的创作观念,也不赞成对杜甫、苏轼的诗歌作“字字寻得出处”的笺注。所有这些学术探索与诗文创作交织在一起的丰富细节,都为人们充分理解陆游“卓然自为一家”的辉煌人生提供了充分依据。

参考文献:

- [1]张溥.会稽续志[G]//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2]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 永瑆,等. 四库全书总目[G].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 陆游. 渭南文集[G]//四部丛刊初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 [5] 何文焕. 诗法家数[G]//何文焕. 历代诗话: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 于北山. 陆游年谱·山阴陆氏世系简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7] 曾枣庄,等. 全宋文[G].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8]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9] 陆游. 陆放翁全集[M]. 北京:中国书店,1986.
- [10] 陆游. 老学庵笔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1] 陆游. 入蜀记[G]//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第3190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12]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3] 扬雄. 太玄经[G]//文津阁四库全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14] 陆佃. 鹑冠子[G]//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第0581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5] 范宁. 春秋谷梁传[G]//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第3676-3677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6] 胡大浚,等. 王符《潜夫論》译注[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 [17] 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8] 薛居正,等. 旧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9] 石介. 徂徕石先生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0]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1]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2] 陆游. 南唐书[G]//傅璇琮. 五代史书汇编:第9册.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 [23] 马令. 南唐书[G]//傅璇琮. 五代史书汇编:第9册.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 [24] 董诰,等. 全唐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25] 荀悦. 前汉纪[G]//文津阁四库全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26] 杜大珪. 名臣碑传琬琰集[G]//文津阁四库全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27] 吴处厚. 青箱杂记.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8] 王铨. 四六话[G]//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第2615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29] 严羽. 沧浪诗话[G]//何文焕. 历代诗话: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0]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G]//顾廷龙. 续修四库全书:第1390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31] 钱谦益. 牧斋有学集[G]//顾廷龙. 续修四库全书:第1391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On Lu You's Family Learning and Weinan Essays

ZHANG Xing-wu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Document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Benefiting from his family learning, the style of Lu You's essays was featured with grace and elegance. As a young boy, he received a strict family education from his grandfather and father. He made a gradual progress in his scholastic learning when he was getting older. Lu You did not focus on a particular area, but his literary creation is fully illustrat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classical allusions, arts of word explanation, and comparison of academic gains and losses. Besides, his travel notes also reflected his comprehensive scholastic accomplishment, and his broad knowledge of inscriptions and geography. All his literary creation not only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his family learning, but also added new approaches for poem interpretation and comments. On the other hand, in his miscellaneous historical notes, Lu You fully inherited his grandfather and father's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of studi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which he applied sublime words with deep meanings for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a strict and brief manner. Indeed, Lu You kept his rigorous thinking logic and tradition for the study of classic historical works, and many of his essays, very similar to notes, reflected the principle of "applying theory to practice" by frequent supplements and corrections. In a word, the interac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literary creation entitled his essays with a totally unique style, and thus it is of great demonstrative value from this perspective.

Key words: Lu You; family learning; essay;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山 宁)